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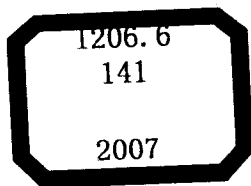
宾恩海

著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

本书的目标就是在文学与文化的深层联系上，在更为广阔的影响文学发展的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上来寻绎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与艺术意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

宾恩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宾恩海 著.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5920 - 1

I. 中… II. 宾…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528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De Wen Hua Chan Shi

宾恩海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20 - 1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温 儒 敏

宾恩海先生这本书叫《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不是什么新鲜的题目，这些年文化研究正时兴，许多评论研究都要和文化挂上钩，以至于看到那种声称“文化研究”的文字，都有某种“固定反应”，不太能引起阅读的兴趣了。但我仔细读了宾恩海先生这本书，发现还是很有意思。该书不是乱套“文化研究”的概念，也没有哗众取宠的花架子，而是把文化研究作为观察文学现象的一种角度，力图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做出新的解释，对既有的研究确有推进。本书的目标就是在文学与文化的深层联系上，在更为广阔的影响文学发展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上来寻绎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与艺术意蕴。可贵的是作者力避现今文化研究“泛化”与“空洞化”的弊病，重视文本研究和文学创作个性研究，保留了文学审美经验判断的“专业色彩”。这本书的确发现和揭示了以往研究中所遮蔽的某些问题，从一新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文学产生的背景，揭示一些作家复杂的精神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

该书力图勾勒现代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的总体文化特征，应当说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蹈空。事实上，书中有些论述也是比较宏观的，但大致还能结合创作现象来谈，一些观点富于启发。比如，书中分析政治文化如何影响茅盾和一些作家三十年代

的小说创作;考察现代报刊杂志的运作方式如何拓展散文的时代性与丰富性,影响散文的文体转型;讨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在意象运用与意境形成方面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等等,都试图从新的层面解释文学现代化追求中所呈现的复杂现象。

我比较欣赏的是该书对某些作家的文化素质、人格构成与其创作关系的探讨。例如把“诗人气质”作为理解与接近鲁迅的一个独特的角度,认为鲁迅在人所常见的事物中发人之未发,由事实而从新省悟,不和众嚣而独具我见,趋内而溯思冥想,以哲人的观察与思考开掘人生内面的精神,注重精神的发扬与个人意志的发展,使自我的艺术追求最终成为富有哲学力量的诗性盎然的独特世界,这一切都可以从“诗人气质”得到解释。由此出发,可能更易于理解鲁迅创作中表现手法、语言形式的一些奇异特征及其寓意上的深刻性。

这种文化研究并不蹈空,注意紧扣文本分析,往往有细致体贴的观点呈现。比如谈到鲁迅小说与绍兴方言的关系,发现绍兴土语的介入如何使鲁迅小说形成特有的氛围、情调和意蕴,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同时让丰厚的地域文化意味散溢而出。类似这些并未脱离审美分析的文化研究,拓展了批评的视野,读来饶有兴味。

说到这里,不妨对文化研究的问题多谈几句。这些年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但成为一“热”之后,也有负面的东西出来了,作为文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与文学不相干了。对此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出要警惕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文化研究在哪些环节能够融入文学研究。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催化剂,需要谨慎的斟酌试验。像宾恩海这本书就比较注重“外围研究”,包括思潮研究、传播研究,也能别开生面。其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攻,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文学研究偏重探求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则是一般性和共性

的现象。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角度方法,肯定是有好处的,同时又是有限度的,限度就是:落脚点仍然应该还是文学。现在常常看到许多文章把“文化”的研究理论放置到文学领域,本意可能也还是要使文学研究“出新”的,但理论“炫耀”的目的太强烈,实际上更加看重理论的操作性和可操作性,兴趣在于引入理论试验,结果往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感觉的,当然也就远离了文学,即使拿文化研究的专业要求来衡量也是走了样的,未必能被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所认可。但是现在这类“大而化之”的文章因为操作性强,结论容易拔尖唬人,甚至常常被误认为就是“创新”,发表出版都很容易。这也是造成学术泡沫的原因之一。读宾恩海先生这本书,我不禁又旧话重提,有感而发,多说这么几句。

几年前宾恩海先生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我是他的联系老师。其实平时联系并不多,常常是他来听我的课,课后可能有几句交谈;有时他也到办公室来,和我谈些查找资料或者选定题目之类,似乎比较腼腆,不擅言词,但看得出是很勤谨、务实而又能沉潜读书的人。果然在他从北大中文系学习回去不久,就写出这本著作,为文学研究添一新成果,让我耳目一新。我很乐于让大家结识这位扎实新进的年轻学者,并希望能就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这个话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2006年7月15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	温儒敏 (1)
---------	---------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化特征	(1)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化特征谏论	(1)
第二节 闻一多诗歌的文化特征	(14)
第三节 李金发诗歌中的爱情及其审美特征	(34)
第四节 宗白华的小诗与“新诗人人格”	(48)
第二章 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	(64)
第一节 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谏论	(64)
第二节 政治文化与茅盾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86)
第三节 刘云若言情小说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理想	(101)
第四节 孙了红侦探小说的平民意识	(114)
第三章 中国现代散文的文化特征	(126)
第一节 中国现代散文的文化特征谏论	(126)
第二节 朱自清散文中的人物描写	(147)
第三节 周作人小品文的人生旨趣	(161)

文化维度的鲁迅阐释

第一章 鲁迅小说的文化特征	(187)
第一节 鲁迅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189)
第二节 鲁迅小说与绍兴的民间文化	(201)
第三节 鲁迅小说与性别文化	(215)
第二章 鲁迅的诗人气质	(223)
第一节 由外部而趋于内向、由表面而趋于深邃的 内在精神	(225)
第二节 “不与众嚣”、“由事实而从新省悟”的鲁迅 思维	(228)
第三节 沉遽庄严、诗性盎然的文学世界	(231)
第三章 鲁迅《野草》的生命意识	(239)
第一节 在虚无中苦苦挣扎	(240)
第二节 死亡意识和文人文化意识	(244)
第三节 现时逻辑价值观	(250)
第四章 鲁迅《野草》的现代主义因素	(257)
第一节 幻灭与绝望:反复质疑现代文明	(258)
第二节 奇崛的孤独意识:现代知识者生命经验的 异质性	(266)
第三节 非实指性、人类普遍性意义、象征主义	(269)
附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方法	(276)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准备	(276)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方法	(278)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展示的崭新的文化 视野	(304)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职业化倾向反思	(314)
第一节 规模化、相似性的符合技术标准的文字 组装	(316)
第二节 理论方法的“西方化”与论述框架的大气 魄大气势	(320)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的职业化的素质	(327)
主要参考书目	(338)
后记	(352)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化特征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化特征谏论

中国现代诗歌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优秀作品思想情感倾向及其艺术品性所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事实上,这也与它所映现的文化世界、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人所取得的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文化信仰。作为自我意识最为彻底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现代诗人及其众多出色的创作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不仅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提供了更为宽阔而亲切的认识方式和言说维度,而且在不同文化交汇的震荡与民族情感的眷顾中体味出他们更为奇崛和丰富的个体生命自由力量与意志。

一、“匡时济危”的时代主题:诗人独立的“自我意识”融入“社会大众话语”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诗歌追随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变化和大众苦难的蔓延将写实与抒情融汇为一体的现实主义表现,具有巨大的意义。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闻一多的《死水》、《荒村》、《心跳》、《一

句话》、《发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臧克家的《老马》、《罪恶的黑手》，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手推车》、《北方》，田间的《给战斗者》，绿原的《憎恨》，阿垅的《纤夫》，辛笛的《风景》，蒲风的《茫茫夜》、《我迎着风狂与雨暴》等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都是比较典型的忧国忧民题材的现代诗歌的艺术表现，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而尖锐现实关怀的“社会大众话语”，确实披露了压迫者/侵略者日益摧折现代中国所形成的苦难感和地狱氛围，那些经过作者理性与情感处理的政治化的悲愤控诉也承续了中国古典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感，但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人已经能在接连不断的社会变革、民族苦难、政治动荡之中自觉地强化着他们的“自我意识”，从而以诗人个人的真实身份和眼光去审视时代变动、大众苦难与诗人自身的密切关系，将诗人独立的“自我意识”融入“社会大众话语”，虽然这特殊的历史情势和现实苦难同样使古今不同时代的诗人们很快进入“社会角色”，但古典诗歌所依恃的传统文化深层意识的“社会角色”绝大多数指向了“匡时济危”这个共同性的时代主题，“在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观念的文化中，个人所着眼的只是在社群照顾下之‘安身’与‘安心’，而且，不论是‘身’或‘心’，都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寄托”^①，古典诗人很难做到或极少篇幅能以诗人个人的目光、角度、意识去审视和思考这些从社会关怀和社会角色出发借以抒愤明志的忧国忧民题材，他们确实不能像现代诗人那样以自由的姿态和相对独立的意志歌哭呐喊，这正是传统文化在深层意识方面制约了古典诗歌的作者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对中国现代诗人而言，身处封建主义及其传统文化被大量蔑视与否定的新的历史背景，个人的权力与自由、独立和尊严并不完全从属于集体的力量和统一的意志，而已经变得那么不屈服。在不断增长的现实要求与压力之下，在不再排斥自我的时代氛围和追求诗歌的现

代化的进程中,现代诗人可以真实地直面现实而记录自己的一块心灵版面。例如,九叶诗派正是力图超越在现实处境的“大我”的抒写从而去实现“小我”和永恒。唐祈的《圣者》、《严肃的时辰》、《最末的时辰》,杭约赫的《最后的演出》、《神话》、《拓荒》、《寄给北方的弟弟》、《噩梦》、《南京》,辛笛的“逻辑”——敬悼闻一多先生》、《回答》、《布谷》,陈敬容的《力的前奏》、《逻辑病者的春天》、《无泪篇》、《冬日黄昏桥上》,唐湜的《手》、《偷穗头的姑娘》,穆旦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杜运燮的《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追物价的人》等,始终贯穿着拥抱历史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的强烈的“人生现实性”,但又不忘却和丢弃呈现诗人自我对于现代诸种现象的深刻而实在的“个人理性要素”。穆旦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己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②。袁可嘉也指出,新诗的现代化,在思想倾向上,则必须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同时保留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与表现论的统一^③。正如其《中国新诗》的发刊词《我们呼唤》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搏斗而前,在历史的道路上跨出自己沉重的脚步。我们面对着的也是一份严肃的工作,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的感情抒发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索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关注。我们应该有一份浑然的人的时代的风格与历史的超越的目光。也应该允许有各自贴切的个人的突出与沉潜的深切的个人的投掷。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历史使我们活在生活的激流里,历史使我们活在人民的搏斗里。”^④可见,九叶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融汇中确认了大众社会价值与自我意识相统一的新诗观念。正因为如此,古典诗人确实很难像他们那样表现出一种

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分裂性、矛盾性和诗人个体孤独灵魂如临深渊般的危机与丰富的痛苦,这主要归因于古典诗歌在审美观念上大多紧紧依赖于传统文化的统一意志以及道德教化力量,并没有突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诗人的巨大的“自我意识”。

二、歌咏母爱、抒写爱情所包含的女性文化觉醒和“以诗去思想”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

与此相关的是,以现代诗歌形式表现古典诗歌常见的思乡、念亲、怀友、叙旧的题材已不具有普遍性,这恰恰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追求的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正是与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识的不断诀别,也就是以现代新诗的凌厉狂放逐渐摆脱传统审美理想所固有的对于诗人个人化的历史经验和独特感受的支配和束缚。换句话说,许多现代诗人就是从古典诗歌意识中获得解放的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化特质的新一代诗人。我们发现,现代诗歌明显增强了伴随着忧伤与哀愁的“母爱情感”的表现和发展,如冰心的小诗在母爱方面的一腔似水柔情大量地熔铸在她所建构的艺术世界里,使其诗歌创作透射出幽逸恬淡的光芒,其梦幻化、知觉化和满蕴着故国典雅温馨文化芬芳的家园意识的诗美传达充分折射出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的怅惘,也生动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那种内在灵魂自我搏斗的令人痛苦的“生活在邪恶中而又热爱善良”的独立个性。郑敏的《金黄的稻束》、舒婷的《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江河的《母亲和我》、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袁可嘉的《母亲》等等都比古典诗歌更加重视“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试图开掘出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情感意象和她们内心闪动的瞬间感悟,以此取代古典诗歌的那种女性文化意识模糊朦胧或普遍压抑的一种单调而悠长的忧伤,其整体的生命感和整体的情绪烘托出诗人对女性文化意识的深切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诗歌因为有了女性文化觉醒

的意义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它仿佛与时间一同流淌的“波浪”一样是无法回头并与古典诗歌的“幽咽山泉”相呼应对称的。

谢冕曾经指出：“旧文学中文人所作的情诗，大都雍容典雅而讲究含而不露，而新文学出现的爱情诗，却以无可阻挡的气势，冲开了禁锢的闸门。它敢于把自由恋爱写成神圣，把男女之大防彻底冲决，而不回避对于表达恋情的真切的抒写。‘我远远的望着你，我近近的觑着你，我紧紧的握着你——’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俞平伯的这首叫做《占有》的爱情诗，不仅大胆地写下了如上的诗句，而且宣言式地呼喊：‘我们要爱，我们要热热的爱。’他在这首短短的诗中，两次挑战性地反问：‘谁敢说这是一种罪过？’”^⑤现代爱情诗的阅读与阐释可以从多种文化意义入手，隐含其间的反叛意识和真挚而崭新的爱情思想观念确实拥有独特的“妒在眼里，喜在心头”的审美感受和诱人的情感魅力，这些爱情诗所积聚的复杂而丰富的情感意义、文化内涵和逼视自然生命的本质力量、诗人关于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同的个体经验及其艺术品性已经远远胜于古典诗歌在表达爱情时的那些象喻和境界。必须叛逆的现代中国和极度膨胀的个人力量尤其使年轻的诗人们深陷于爱的痛苦并同时获得春天般的欢悦和幸福，他们为决裂于传统文化意识而唱响了自然生命的赞美之歌：“我没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又怎么能嫁给他？”（黄琬诗）“聪明贞静的姑娘，你肯不肯和我相恋？我的相思和你家的桃花，一齐红到了你的窗前。”（汪静之诗）“吁，紧抱我一点：将气息错乱血儿疾涨，使我感到幸福之始末。”（李金发诗）这些大胆率真的热烈恋情所包含的灵肉的强烈躁动也往往有一种美的氛围，这便是“五四”以来同传统文化诀别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新的崛起。它作为一种不断抗争和取替传统文化意识、生动体现历史迭变和精神蜕变的文化行为尤其对爱情诗写作的情感立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歌咏爱情的大量诗歌实践勇敢无畏地剔除古老的爱情观

念和那些含而不露、言近旨远的情调以及过于理性控制、过于伦理教化的精神向度。在传统文化不断衰退和西方现代文明不断侵入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爱情诗将在这一代青年手中恢复它的个性和真实。年青的歌者们在把诗的触角深入到现实发展的脉搏的同时,也深入到人的和社会同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爱情之歌是心弦的颤动”^⑥。现代新诗的对于爱情生命意志的追怀和颂赞,无论是郭沫若的“炽烈而透明”,徐志摩、朱湘的“浓丽华美”,还是何其芳的“缠绵而轻柔”^⑦,无论是李金发的幽深而晦暗、恍惚而怪丽,戴望舒的哀怨而迷蒙、轻柔而孤寂,闻一多的清切而风趣,刘大白的细腻而悠长,还是湖畔诗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的“孩子们的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朱自清语)以及倾向于英美现代主义的冯至和穆旦的幽婉深沉,都普遍构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挑战和有效反拨,这一文学实践正可视为中国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充满探寻和对话渴望的文化发展的潜在力量,其文化效应是无法估量的,正是由于现代文化的介入而使现代爱情诗才产生出远比古典爱情诗更为强大的活力。

古典诗歌的确不易于从女性关怀出发揭示女性生存的压迫性因素,它更多是以悲剧的眼光和诉难意识审视女性生活,除却诗作者的对于女性世界缺乏独立自主的观察和开掘以外,这自然与封建时代的女性自身在封建主义及其文化统制的合力作用下备受磨难、无法摆脱悲苦处境而普遍缺乏自我意识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而把“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开掘作为一种诗人的理想状态和思想力量来看待,这对于理解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理想状态和思想力量不断地推动着诗人达到更完美的境地。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哲理化”所走过的轨迹也可以看出,如此专心致志地探求人生终极的价值观念、个体生命的内面精神、人的存在的空虚苦闷彷徨绝望诸种情感及其本质特征同样也与诗人的“自我意识”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哲理诗实际上是现

代诗歌本身繁复的情思与诗人个人化的内在感知、深度思索的一种契合,它所具有的哲学意味也正源于不同的诗人关注生命存在、探询人类命运的具体的“个人化”的形而上的思维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人由于受到西方科技文明的强烈刺激而更沉潜于人生内面精神的庄严深邃的开掘和思索,再加上诸如日本俳句、印度短歌等国外现代哲理诗与西方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现代诗歌“以诗去思想”(穆木天语)的自觉意识和这些诗歌哲理化的沉思冥想的个体领地则远远胜于古典诗歌。宗白华的小诗、冯至的十四行诗的“潜在的哲学的冥想”纯粹是文学性的、个人化的,他们从“诗与哲理研究的接近”入手,“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朱自清语),热情关注中国新诗哲理化这一时代命题。诸如,宗白华的小诗总是涉及到宇宙自然,探索物我相融的奥秘,抒发天人合一的幽深的哲理思想,他并不是寻求冰心、刘大白等人在诗的哲理化的表述上重视实用性的人生经验的自我陈述,而是以哲学观念为主体,将自己的哲学思索和诗性直觉的文化审美、心灵闪光的智性创造融为一体,表现出更加细腻、更多文人化的艺术倾向,宗白华所实践的诗的哲理化的主要特色在于以哲学观念作为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在人神沟通的关系中保持着一种贴近大自然的自由心态,始终是从自己对于大自然的真纯经验出发,充分表达诗人个体生命的感悟和对于自然界生存的深层情绪的直感体验,其作品内涵往往具备丰富的哲学底蕴。仅仅就诗人将个体生命作为个体的抒情世界这一层面的意义而言,冯至的十四行诗更能让我们领略到耐人沉思的“忧郁而神秘”的生命情调和无人认识的“雕刻的”、“结晶的”、“凝重的山岳”般的人生体验的“新意志”以及“宇宙的觉识”。比之于宗白华的小诗,比之于古典诗歌,冯至的十四行诗对于哲理化的沉思冥想的个体领地略显抽象。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

遇,凡是与他的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重重地震撼了他的生命或轻轻地使他的身心颤动的^⑧,冯至均留下“感谢的纪念”,诸如《南方的夜》、《听——》、《希望》、《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威尼斯》、《鼠曲草》、《我们准备着》、《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和《给几个死去的朋友》等等,关于时间与人的存在以及自然万物的勃动新生诸多思考,无不抽象而又充盈着丰富生命力的“意象化的写实”,让人领受到人类精微博大的生命得以超升的启示和指引,其哲理意蕴十分深刻动人。冯至在揭示诗人的内心生活和情感世界的“个人化”的思维特征方面(诸如,对一些不易确定的感悟给以定型;并不直接抒情和传示人生和事物的经验本身,而是提炼和升华所观察和感觉的一切,使之与诗人的血液、目光、姿态融化而不可分离时形成诗句;在平淡生活里发现诗意和哲理)则远胜于中国古典诗歌。更进一步而言,冯至的十四行诗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以诗去思想”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它至少表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历史进程中冯至所发掘的一些崭新的文化主题性的意象、象征、比喻、情调和哲理思考,至今读来仍有不少读者难以理解,这显然是我们与冯至的十四行诗内在的文化特性疏离得更远的缘故。“《十四行集》是一个绝对的孤立事件,与新文学主潮构成了距离,与读者保持了文化沟。新文学一开始就积极介入现实,战争、政治、劳工潮、恋爱潮及全方位的思想解放与革命,而对于生与死、灵与肉、生存与命运等形而上的问题拒绝思考。——读者所喜好的是热闹、刺激,在喧闹中求欢愉,放鞭炮烟火,听大锣重鼓,而冯至的花园里只有无语的花朵,以心灵的波动传达宇宙深处的信息”^⑨。读者与诗作者这种文化上的隔膜关乎彼此对于诗篇本身的语言的创造性、艺术的完整性、真实的人生世界、文学的独创性等深层次问题是否能取得统一。正如郑敏所言,冯至的《十四行集》“溶汇了古典诗人杜甫的情怀,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的高度哲理和奥地利早期现代主